自我民族志:内涵、特征解读与中外使用情况比较分析

蔡传杰，丁邦平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摘要:介绍了“唤醒式”质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的内涵与特征;基于 WOS 核心数据库中的 2 478 篇文献,对国外自我民族志研究的特征与热点进行了文献计量分析;结合我国对自我民族志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对国内的研究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同时也呼吁比较研究学者关注这种新的质性方法。

关键词:自我民族志;后现代主义思潮;文献计量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34;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2)02-0062-05

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发轫于 20 世纪后半叶,作为一种新兴的质性研究方法,它出现在客观主义传统让位给自我反思的质疑声此起彼伏时[1],对民族志研究在当时出现的困境产生了强有力的回应。它要求研究者使用“唤醒性”故事的形式,揭发自我的脆弱、情绪、身体和精神,以此产出令人回味的故事,创造出现实性效果[2],弥补了民族志研究中缺失个人伦理道德赋予关注的部分,在寻求读者将自身引出对话的同时,善于引起人们的同理心,以此促成社会人文观念融合。

一、内涵与特征

“普遍紧张”作为一种当代自我意识,已经植入到民族志的实践与经验当中,迫使备受质疑的传统民族志发生了转向[3]。从道德、政治、伦理及认识论层面来看,民族志研究都无法应对一个新的问题:铭刻自我的研究陷在两难之中难以突破[4]。史密斯(Smith)认为,构建所有人共同的体验极不负责任,民族志学者有义务通过道德性方式重新描述在该领域中的某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5]。解决这种问题依旧使用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方式,很大可能会出现事实偏见。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在参与生活与文化的背景之下,描绘个体经验的心灵图景,即通过一种特殊的、有意识的实证手段,充分掌握和理解个体的生活和文化可能,将“自我”出现的困境完整展示。这种方法在脱离社会参与者约束与观察的情景下进行,要求个体将文化资本放入生活经验中进行定位,即“我”如何经验“他人”。试图理解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时,可以使用“他们”所在的视角,而他们的描述能够代表或唤醒一部分人的生活。这种写作形式被冠名为“自我民族志”[6],它与其他诠释社会主体地位的传统民族志研究存在一个本质不同,即参与者投射现场的方式是虚拟的[7]。以个人意识和经验描述为故事线,自我民族志所体现的研究特点即是人类学研究的反思性转向。同时以“普遍紧张”为基础,形成了对个体印象和扎根观念的主观性、创造性的表达。它的出现以个体与世界联结的方式,终结了“他人”研究赋予的“特权知识”垄断。

后现代主义中主观的自我、差异的变化、观点的浮现以及个体与世界的并置,都是某种个体真理下不稳定的故事[8]。但恰恰是这种不稳定的主观体验,却

收稿日期:2021-12-17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新时代安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战略选择与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AHSKY2019D041);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新时代长三角区域高等教育国际化竞争力研究”(项目编号:2020CX170)

作者简介:蔡传杰(1992—),男,安徽合肥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教育。

带给了人们“唤醒性”的思考与有效指导。民族志研究转向示意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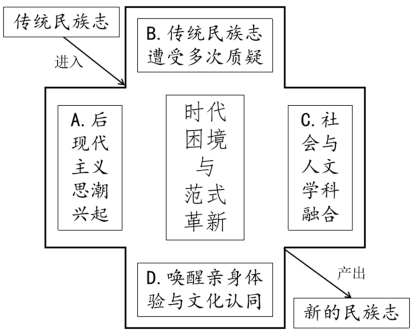

图1　民族志研究转向

从自我民族志致力于对个体的经验进行描述这一举动来看，它能够透过合理地配置、分析和规范程序，指导具体的自我意识，形成连贯的自我稳定。它拥有介于具体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之间的定位，是一种中观层面方法，也是一种特殊的“自传”与“对话”，这成为它与传统民族志的最大区别。后者的特征在于“熟悉他人”，而前者则通过实践完成中心主体的转变，实现了“使自我不再模糊”的辩证[9]。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就能够通过自我认识形成收集数据和形成意义属性的过程，借着“唤醒”回忆挖掘个体在二阶视角(the second-older perspective)下对世界的普遍认识、经验和体验。

自我民族志研究内在展现了“我要研究的范围”“我的内容和层次”以及“我的经验假设”三个方面的内容。在这种纯粹且特殊的叙事手法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间的距离被大大缩短，更为容易提供真实数据，增加研究的可信度。当研究者需要描述一个故事以呈现某种印象或结论时，传统民族志研究可能会对相关无法披露的细节进行掩盖，但自我民族志在减少偏见的同时，能够展示更多读者想要读取的经验，同时能够在这种经验的分享中产生思维和时空对话。

从写作形式上来看，它能够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在“大山孩子落户一线城市何以可能”这一议题中，王兆鑫通过自我民族志研究描绘出了四个不同维度：教育在乡土和家庭间的相互建构、家庭内部的教育投资与情感支持、教师与学校在乡土中的社会地位和符号权利、乡土社会特有的贵人文化[10]。这种明确的社会分层，一方面能够给予具有相同体验的读者感同身受的境遇，另一方面也能够让教育者聚焦微观的实践落脚点，考察特定群体的教育伦理。所以这种写作形式的登场，注定是价值与难度同在，它旨在创建人类学对于自我的认知内涵、分析手段及其关涉的整套话语[11]。而它的醉翁之意却不在主人公形象化的“志中有我”，相反它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在唤醒人们的身份确立，将感受者们“引我入志”。显然这样的方式引出了自我民族志的本体论假设，即旨在回答一系列质性方法的实在特征究竟为何，当然也展现出了个体与文化之间的重要性，证明了自我民族志在哲学层面产生的“非二元”逻辑。这种叙事方式也透视出它的认识论特征，即挖掘潜在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逻辑联系[12]。自我民族志的出现对教育哲学及实证研究产生了直接冲击，通过“照镜子看自己”的批判体现出了重要价值。

自我民族志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见图2)。哲学层面具有“非二元性”的特点，将个体与生活文化体验紧密联系，即个体被唤醒的思考与体验、经验与观念。方法层面采用二阶视角，强调研究者主观描述的基础，并试图通过将经验带入到文本当中，以获得身临其境的故事体验。结果层面尝试展现研究主体的全貌，集中叙述“我”在某个特定时空中对于某一个文化现象或事件的表征认知与深层理解，以唤醒持有相同经历的读者亲身体验与观念认同，并以此展开具有批判精神的交流与对话。相较于其他反思性方法，自我民族志已经能被质性研究领域广泛接受[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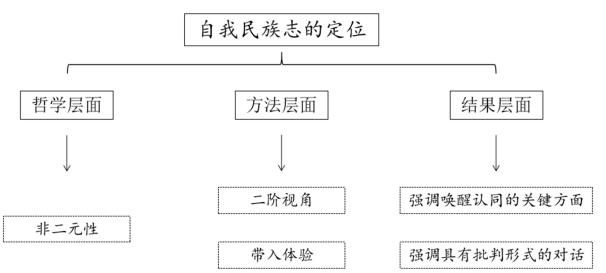

图2　自我民族志的特征

二、数据收集

当下我国的自我民族志研究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且与教育研究关系不够密切，因此对于国外文献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Citespace软件多元、分时、动态的分析，能够将其来龙去脉集中展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14]。在“Web of Science”(WOS)中进行英文检索，设置主题词为“auto-ethnography”，共计命中2 478篇，时间线范围为1993—2021年，检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

以纯文本格式导入 Citespace 中进行分析。

三、国外研究的特征与热点

(一)阶段文献量

年文献量的整体布局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 1993—2002 年,为“萌芽阶段”,这一阶段的年均发文量为 1.4 篇;第二个阶段为 2003—2014 年,为“起步阶段”,该阶段的年均发文量为 49.75 篇,在这一阶段中,年发文量突破个位数;第三个阶段是“发展阶段”,从 2015 年开始,至今尚未结束,在 2015—2020 年间,年均发文量为 296.5 篇,在实现了百篇突破的同时,也使这一种较新的质性研究方法在人类学领域体现了重要价值。

(二)国别

文献量超过 100 篇的国家分别为美国(1010 篇)、英格兰(379 篇)、澳大利亚(288 篇)以及加拿大(239 篇)。从语种上来看,有 2 399 篇文献使用英文撰写,37 篇文献使用西班牙语写作,使用小语种超过 5 篇的还有 19 篇的葡萄牙语文献、7 篇的法语文献以及 7 篇俄语文献。

(三)核心作者及作者群

数据显示共有 3 173 位作者,发表了 19 篇文献的格洛维茨基(Gloviczki)成为最大贡献者。根据普莱斯定律,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数值计算公式为 $N \cong 0.749\sqrt{\eta_{\max}}$,计算结果为 $N \cong 3.26$。结果表明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应当不少于 4 篇。统计后发现核心作者实际达到 62 位,超过 10 篇的 6 位核心作者分别为 19 篇的格洛维茨基、12 篇的埃利斯(Ellis)、11 篇的亚当斯(Adams)与莫雷埃拉(Moreira)、10 篇的普洛斯(Poulos)与施瓦布斯基(Szwabowski)。亚当斯与曼宁(Manning)、博赫纳(Bochner)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埃利斯与博赫纳、莫尔斯(Morse)、理查德森(Richardson)等长期进行合作。

(四)主要基金

基金的支持是自我民族志研究的保障。共有 2 252 篇文献获得了基金支持,占文献总量的 90.9%。英国的研究与创新协会对 29 篇文献提供了基金支持,经济与社会研究会对 18 篇文献提供了基金支持。美国的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则为 10 篇文献提供基金。此外,支持超过 5 篇文献的基金单位还有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所、加拿大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研究会以及英国的工程与物质科学研究会等。

(五)主要研究机构及合作情况

有 1 202 家机构参与到了研究当中,佛罗里达大学贡献了 65 篇文献,成了机构中的榜首。超过 30 篇的机构分别有 65 篇的佛罗里达大学(美国)、48 篇的伊利诺伊大学(美国)、43 篇的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以及 34 篇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加拿大)。主要的研究机构存在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而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它们内部算是家常便饭。但事实上,这种合作也存在着三种分类形式:第一,以美国佛罗里达大学为例,它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现粗线条连接,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校际合作;第二,以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为例,它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间存在着国际合作;第三,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为例,在它内部的不同院系之间,存在着校内合作。

(六)主要出版物

国外自我民族志研究共有 847 种出版物来源,这些出版物大多为教育出版物。其中 *Qualitative Inquiry* 载文计 345 篇,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出版物。超过 80 篇载文的出版物共有三家,分别为 345 篇的 *Qualitative Inquiry*,108 篇的 *Qualitative Report* 以及 87 篇的 *Cultural Studies-Critical Methodologies*。

(七)教育研究

在这些文献当中,纯粹的教育研究文献共有 467 篇,占总量的 18.85%。它们分布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等不同领域。以 2020 年的教育学相关文献为例,当年共计有 18 篇相关文献发表,其中比较教育占 27.78%,高等教育占 27.78%,教师教育占 22.22%。虽然它不是比较教育领域的一个专门化的研究方法,但通过对某个特定文化下的个体深描这一特征,确定了其成了可以被比较教育研究所使用的有效方法。

四、我国的研究进展与启示

(一)我国的研究进展

第一,我国共有 22 位作者发表了 17 篇介绍自我民族志方法论或使用自我民族志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其中 2011 年有 1 篇,2014 年有 1 篇,2017 年有 3 篇,2018 年有 2 篇,2019 年有 6 篇,2020 年则有 4 篇。近 10 年间,年均发文量为 1.7 篇。

第二,所有中文作者均只参与贡献 1 篇文献,且

在2020年之前，合著论文的作者仅存在两种形式，第一是校内不同院系之间的合作，第二是省内不同院校间的合作。直到2020年成都体育学院的杨茜与武汉商学院的郭晴共同讲述了三代家人的体育故事[15]，才打破了这种固有的合作局限。

第三，共有8篇文献获得基金支持。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出现4次，全国艺术科学规划课题出现1次，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出现1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出现次1次，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也出现1次。大部分基金支持都来源于文科基金或课题。

第四，共有22家机构参与到自我民族志的研究当中，分别为：湖南省的中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湖北省的武汉商学院和武汉大学；江苏省的河海大学、南京大学、江苏师范大学与南京林业大学；四川省的四川大学和成都体育学院；上海市的上海外国语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台湾地区的台湾政治大学；北京市的北京师范大学；广东省的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中山大学；河南省的郑州大学；浙江省的浙江师范大学；重庆市的重庆第二师范学院；福建省的福建中医药大学与福建师范大学。

第五，这17篇文献中共有5篇来源于中文核心期刊，另有5篇来源于CSSCI期刊，其中《体育与科学》《中国青年研究》载文2篇，其余期刊均载文1篇。自我民族志研究在两种核心刊物中发表的总量占文献总量的58.82%。

与国外文献各类指标的三个不同之处，第一是数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说明我国对自我民族志的关注热情与文献数量远远不够；第二是我国使用自我民族志方法进行研究起步晚、发表的文献少；第三则是我国教育领域在自我民族志研究中的比值不高，说明我国学者对这种研究方法并没有过多了解和应用。

（二）相关启示

自我民族志研究的全球化表明，质性研究界出现了别样图景，让不同阶级、文化和背景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对亲身体验的故事产生共鸣。它不仅是一种自传式的研究方法，更是一种将写作置于文化、社会、政治和个人历史背景中的科学经历，基于个体描述的证据，学术、实践和研究的专业人员可以把他们过去的经验带到现在的位置，并对未来造成正面的影响，也为专业人员提供明确的实践方向[16]。对我国质性研究领域而言，国外经验有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唤醒教育研究界的认同。由国外经验来看，自我民族志可用以指导各种质性事件，在教育与教学层面上同样大有所为。对教育来说，它能够起到协同管理的作用，有效指导高等教育、特殊教育、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对教学来说，比如在科学学习过程中，它可以使学习者获得学习科学缘由的必要体验，唤醒自身的科学精神，增加对科学学习的兴趣。

第二，发展比较研究。比较研究领域有两种较为适合的研究方法，首先是在二阶视角下对群体观念进行深描的现象图析学研究[17]，其次是自我民族志。2015年之后自我民族志在国外比较研究中已经占据了一席之地，但我国的自我民族志研究才刚刚起步，以对自我民族志的本体论假设、认识论假设以及方法论假设展开具体研究是留给比较研究者的工作，希望他们能够借着自我民族志对基于本国、本地域或者获得相似体验的个体展开比较研究，从而有效推动基于本国思维的比较研究发展。

第三，进一步明确质性研究的信效度和重要作用。首先是信度问题，量化研究与实证主义有单向的唯一对应关系，因此比较容易辨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而质性研究则与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都有联系，因此更难以辨识其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18]。自我民族志的出现从价值与规模上都打破了这种偏见。它作为理论与写作形式挑战了传统的研究标准，将以往过于分离化的研究模式与表达模式进行了融合[19]，研究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之间通过事实的陈述已经变为“合法写作”[20]。这种自发性、反省性的人类学表达形式充分考虑和利用了个体作为研究工具的经验、感知与体验，这一转变是具有质性革命价值的。所以自我民族志的研究信度，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相同时能够被验证具有可靠性。其次是效度问题，它的叙事风格出现也带给了质性研究新的思考，最先展开的是“自我对话”，强调对自我的辩证，研究者更愿意将所需要提取的信息公开，以获得批判与对话。它更像是一种规避型的方法论，用以在防止文化异化的同时，不断关注相同体验者的生活和经验。

五、结语

作为一种具有批判性的质性研究方法，自我民族志在不断唤醒人们反思个体文化中的权利不对称，以保证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下，社会能够持续稳定运转。

人们描述的话语、社会单元中的话语层次传统以及教育等环节的学习与互动形式，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未来职业造成持续影响[21]，如果在生活中出现更具对话性的个体互动形式，则能够打破传统的“文本懒惰”规则[22]，在经验性的视角下指导教学活动，以及加深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对自我民族志研究的解读，是一场充满批判与情感经历的过程，也是对质性研究是否具有说服力的一次回应，相信从 2022 年起，自我民族志能够在教育及其他比较研究中越来越受重视。

参考文献：

[1] WEST J. Ethnography and Ideology：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Representation[J]. Wester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57：209-210.

[2] ELLIS C. Heartful Autoethnography[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1999，9(5)：669-683.

[3] GEERTZ C. 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M].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37.

[4] TYLER S A. Post-modern Ethnography：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Clifford J，Marcus G E.(Eds.). Wr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M]. 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112-140.

[5] SMITH P. Killing the Spirit：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M]. New York：Viking，1990：3-42.

[6] DEBORAH R D. Auto-Ethnography：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M]. Oxford，UK：Berg，1997：2-18.

[7] STRINE M S. Understanding “How Things Work”：Sexual Harassment and Academic Culture[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1992(20)：391-400.

[8] GOTTSCHALK S. Ethnographic Fragments in Postmodern Spaces[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1995，24：195-228.

[9] GOODALL H L Jr. Turning Within the Interpretive Turn：Radical Empiricism and a Case for Post-Ethnography[J].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1997，11：153-157.

[10] 王兆鑫.“走出乡土”：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J]. 北京社会科学，2020(5)：26-36.

[11] 徐新建. 自我民族志：整体人类学的路径反思[J]. 民族研究，2018(5)：68-77.

[12] CRESWELL J W.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Research Design：Choosing Among Five Approaches[M]. London：Sage，Inc，2005：2-10.

[13] PLODER A，STADLBAUER J. Strong Reflexivity and Its Critics：Responses to Autoethnography in the German Speaking Cul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J]. Qualitative Inquiry，2016(22)：753-765.

[14] 陈悦，陈超美，刘则渊，胡志刚，王贤文. CiteSpace 知识图谱的方法论功能[J]. 科学学研究，2015，33(2)：242-253.

[15] 杨茜，郭晴. 媒介、受众与权力：一个女性体育迷的自我民族志[J]. 体育与科学，2020，41(3)：79-85.

[16] O'HARA S. Autoethnography：The Science of Writing Your Lived Experience[J]. HERD-Health Environments Research & Design Journal，2018，11(4)：14-17.

[17] MARTON F. Phenomenography-Describing Conceptions of the World Around Us[J]. Instructional Science，1981，10(2)：177-200.

[18] 张汉. 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辨析[J]. 国外理论动态，2016(5)：47-57.

[19] LANGELLIER K M. Personal Narratives：Perspectives on Theory and Research[J].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1998(9)：243-276.

[20] BANKS S P，BANKS A. Reading ‘the Critical Life’：Autoethnography as Pedagogy[J]. Communication Education，2000，49(3)：233-238.

[21] GOODALL H L Jr. Casing the Academy for Community[J]. Communication Theory，1999(9)：465-494.

[22] ECO U. Six Walks in the Fictional Woods[M]. 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4：17-33.

(下转第 82 页)

参考文献：

[1] 孙以楷，陆建华.《逍遥游》之逍遥[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25.

[2] 陈赟.《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寓言[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35-142.

[3]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4.

[4] 陈引驰.庄子精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3.

[5] 王博.庄子哲学[M].2 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2.

From“Peng” to “Xiaoyao(calm and master of oneself)”: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ZhuangZi's Thought of Xiaoyao

ZHANG Jinbo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ZhuangZi's thinking of Xiaoyao (calm and master of oneself) is based on a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existence of individual life and its situation in the world, and ultimately on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the practical path of individual calm and master of one's findividual life. In *Xiaoyao You* (*An Account of a Carefree Journey*), Zhuangzi uses the “Peng”(a species of bird) as a metaphor for individual life itself, and uses its different appearances as a metaphor for the different states of individual life in the world, pointing out that the calm and master of individual life must return to individual life itself, and that only when on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himself can one speak of Xiaoyao. The two dialogues between Zhuangzi and Hui Shi about “Hu”(gourd) and “Chu”(simarouba) are used as an interpretative context, pointing out that the realistic path to individual calm and master of life lies in not stagnating in oneself and not moving to things, but seeking a realistic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ings and oneself in order to achieve Xiaoyao.

Keywords: Zhuangzi; Peng(a species of bird); Xiaoyao (calm and master of oneself)

[责任编辑　夏强]

(上接第 66 页)

Auto-ethnograph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 Interpretation,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Usage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CAI Chuanjie, DING Bangping

(College of Educatio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uto-ethnography of the “awaken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Based on 2478 documents in the WOS core database,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otspots of foreign auto-ethnography was carried out.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uto-ethn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it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lled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scholars to pay attention to this new qualitative method.

Keywords: auto-ethnography; postmodernism; bibliometrics; comparative research

[责任编辑　李潜生]